

东北抗战音乐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时代价值探析

刘昊

[摘要] 东北抗战音乐诞生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它以独特的艺术形式承载了革命文化内涵和历史记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东北抗战音乐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武器，它在白山黑水之间奏响了反抗侵略的激昂旋律。从斗志昂扬的战歌到饱含悲愤的民谣，东北抗战音乐以其独特的魅力，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中华民族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阐释东北抗战音乐文化在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中的独特价值与不可磨灭的地位，能够为深入理解中国抗战文化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提供全新的视角和理论支撑。

[关键词] 抗日救亡；东北抗战；抗战歌曲；抗战音乐文化；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J6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36(2025)04-0095-07

DOI:10.20093/j.cnki.CN21-1080/J.2025.04.12

中国人民经过14年浴血奋战，以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与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抗战一样，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毛泽东曾评价说：“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2]

抗战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和情感表达，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一首首反映东北人民奋勇斗争和在东北地区创作诞生的抗战歌曲，发挥了除枪炮之外的“另一种武器”的力量^[3]。

本文以东北抗战音乐为研究中心，将东北抗战音乐作为具体研究对象，深入探讨其蕴含的丰富历史意义和独特的时代价值，以期更好地挖掘东北抗战音乐文化的教育功能和重要价值。

一、东北抗战音乐文化生成的历史语境与现实动因

日本侵华导致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19世纪下半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进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加速发展，日本本土资源的有限性成为其发展瓶颈。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世界局势动荡不安，日本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在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日益猖獗，并试图通过侵略中国来获取资源和市场。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蓄意制造事端并迅速占领中国东北三省，随后逐步向华北地区渗透，妄图蚕食整个中国。这一时期，中国国内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大片国土沦陷，无数百姓流离失所，人民遭受侵略者的残酷迫害。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国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救亡运

作者简介：刘昊，沈阳音乐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高校思政专项）“辽宁红色‘六地’音乐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L24BSZ026）。

动风起云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慨，展示了坚决抵抗的决心。“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4]东北人民不甘心做亡国奴，纷纷自发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在东北各地陆续建立，并联合义勇军等抗日力量，逐渐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中流砥柱，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

东北抗战事迹成为这一时期爱国文艺创作的核心素材之一。当时的《京报》《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救国旬刊》等对此进行了连续报道，而这些报道也成了爱国进步艺术家的创作素材。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在上海等大城市蓬勃开展。众多进步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会聚在一起，他们以笔为剑、以歌为号，通过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多种艺术形式宣传抗日思想，唤起民众的觉醒。田汉、聂耳等便是左翼文化运动中的杰出代表人物，他们活跃在文艺创作的前沿阵地，积极致力于创作具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文艺作品，以激发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和抗日斗志。

东北抗战音乐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创作生成。东北抗战音乐不仅涵盖了抗日战争时期在东北广袤地域内，由抗日军民、文艺工作者等群体创作的，直接服务于抗敌斗争、鼓舞军民士气的各类歌曲、歌谣，如《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露营之歌》《爱我东北》《九一八事变歌》等；还包括了那些虽创作于其他地区，却以东北人民在14年艰苦卓绝的抗日历程中展现出的不屈意志、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为题材，生动反映东北民众抵御外侮、捍卫家园精神风貌的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大合唱》《松花江上》等。韩玉成收集整理的《东北抗战歌谣歌曲集》收录了近千首东北抗战歌谣歌曲，其中，歌谣678首、歌曲300首，以东北抗联所创作的作品为例，作者包括了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周保

中等诸多东北抗联将领。这些作品题材丰富，既有控诉日本侵略者暴行、揭露其侵略本质的呐喊，也有歌颂抗联将士奋勇杀敌、军民同心协力的战歌，更有抒发缅怀抗战烈士之情与光复家园坚定信念的民谣，这些都成为东北抗战历史中极具感染力的文化和精神记忆。

二、东北抗战音乐文化的核心特质与功能作用

每一部音乐作品都是一种社会事实，其内在结构中沉积了社会关系。阿多诺认为：“材料对主体施加的种种要求，反而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材料’本身就是沉积的精神，是由人类意识社会性地预先形成的。”^[5]音乐从来不是“纯艺术”，它总是嵌入特定社会关系之中。在抗日战争时期，抗战音乐作为一种文化力量，在极端艰苦的抗战环境中孕育并蓬勃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东北抗战音乐的节奏、旋律、语言的“群众化”“号召性”成为政治动员、文化传播的形式反映，不仅成为东北人民抵御日本侵略者的精神旗帜，更以其强大的凝聚力、感染力唤醒了东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的抗争意识，并以其独特的叙事结构激发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批判性审视，深化了全世界人民对普遍正义价值的共同追寻和捍卫。

（一）政治动员

1. 激发民族觉醒与抗争意识

抗战文艺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的历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建构党领导的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6]。东北抗战音乐以其激昂悲愤的旋律和质朴有力的歌词，将抗日救亡的政治目标转化为大众可感知的情感符号，唤醒民众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对侵略者的强烈反抗意识。如1936年，由张寒晖创作的“流亡三部曲”之一的《松花江上》，虽然其诞生地并不在东北，但歌曲如泣如诉地描绘了东北人民在日本侵略者铁蹄下失去家园的惨痛遭遇，歌曲用四三拍的节奏让整体旋

律更加抒情。“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歌曲传唱之处，激发了民众对国土沦陷的悲愤和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使人们深刻意识到民族危亡的紧迫性。再如天兰作词、冼星海作曲的《九一八大合唱》中唱道：“莫说东北老百姓，都是善良好欺负；他们不做亡国奴，不过牛马苦生活……这些道理又不多，要打鬼子怕什么……”这种音乐上的共鸣，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抗日怒火，使东北人民从最初的迷茫与悲愤中觉醒过来，激发起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抗争精神，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成为凝聚民族力量、推动抗战胜利的精神支柱。

2. 宣传抗日主张与揭露侵略者暴行

抗战音乐成为传播抗日思想和主张的重要媒介，通过传唱抗战歌曲，东北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深刻认识到抗战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同时，许多抗战歌曲也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暴行，如由东北抗日联军（以下简称“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等人创作的《露营之歌》是在经历了几次激烈战斗后才写成的，其中“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荒原水畔战马鸣。围火齐团结，普照满天红”等词句，隐晦而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抗联战士在艰苦环境下与侵略者的顽强斗争，也侧面展现了日军侵略造成的民族灾难，激发了全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公愤和对东北抗战的同情与支持。

3. 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

东北抗战音乐跨越了地域、阶级和党派的界线，为抗日力量的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无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是国民党爱国将领的队伍，抑或广大的普通民众，都在这些音乐的感染下，找到了共同的目标和信念，那就是抗击日本侵略者，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音乐作为凝聚民心的文化载体，在唤起民众的抗日救亡意识、增进社会各界的情感共鸣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如《新编九一八小

调》中唱道：“九月十八又来临，不分党派大家一条心……‘亲善合作’不要听，抗日救国要齐心。”再如《联合歌》中唱道：“中国人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我们奋斗，我们牺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生存！”这些抗战歌曲的传唱促进了全社会各阶层的觉醒和团结，大家齐心协力，共同为抗战胜利而英勇奋斗，彰显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伟大力量。

（二）文化凝聚

1. 地域文化的坚守与延续

东北抗战音乐深深扎根东北的黑土地，东北地域文化成为东北抗战音乐的“精神土壤”和“艺术母体”。东北抗战音乐的内容表达和艺术形式都汲取了东北民间音乐的丰富养分，将二人转、东北民歌、东北民谣等独特的音乐元素融入了抗战歌曲的创作。如《流血纪念歌》是根据东北广为流传的《孟姜女调》填词而成；《满洲苦》是根据东北民歌《卖饺子》的旋律填词而成；《骂老廉》是根据东北器乐曲牌《祭腔》改编填词而成。而《农民小唱》《吃饱喝足杀东洋》《百姓靠老杨》等均采用了二人转、奉天落子的曲调，节奏简洁明快，易为民众传唱。这些音乐作品在战火纷飞中传承了东北的语言特色、民俗风情和生活气息，为东北地域文化在抗战岁月中得以坚守和延续作出贡献，成为维系东北人民文化根脉的纽带。

2. 传统与时代的融合创新

抗战的时代背景促使东北音乐艺术在形式和内容上实现了重大创新突破。东北地域文化蕴含的“家国情怀”“故土眷恋”“豪爽坚韧”特质为东北抗战音乐创作提供了养分。在内容上，东北抗战音乐创作跳出了以往的生活琐事内容，紧密围绕“抗战救亡”这一宏大主题，如取材于东北抗日义勇军事迹而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的歌词和令人振奋的旋律，表达了全国人民抗击侵略的坚定决心，使音乐作品承载起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在形式上，合唱、组歌等新形式蓬勃发展，并且在和声、配器等方面大胆尝

试,如融合唢呐、板胡、锣鼓等东北民间乐器,让抗战音乐兼具乡土气息和激昂气势,增强了抗战音乐的表现力和感染力。这种创新不仅丰富了东北音乐的艺术表达,更为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推动了传统音乐向现代音乐的转型与跨越,为中国音乐艺术的创新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3. 抗战历程中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借助外部媒介,以符号化的方式将巩固认同的知识和意义长久储存。”^[7]东北抗战音乐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通过歌曲这一可传播的符号形态,传递了民族苦难与抗争精神。东北抗战音乐详细真切地记录了东北人民从遭受日本侵略的苦难,到奋起反抗、浴血奋战的全过程。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的流亡之苦,到东北抗联战士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再到东北人民对胜利的不懈期盼,都在音乐中得以体现。“有反映东北抗联战士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如《向前走别后退》《抗日战歌》《冲锋号》《战斗射击》,有反映东北抗联部队建设的,如《练兵歌》《战斗职责》《男儿励志歌》,还有反映抗联欢庆胜利的,如《西征胜利歌》《凯旋歌》。”^[8]在这些歌曲中,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得以用音乐形式永恒定格,为后人研究东北抗战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历史的“活化石”,帮助我们还原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三) 国际传播

1.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体现

音乐作为文化传播的媒介,能跨越意识形态边界,塑造国际认同。东北抗战音乐蕴含的反抗精神是人类面对压迫时共有的本能反应,“不仅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宏阔视野下,孕育出深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中国人民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紧密相连”^[9]。东北抗战歌曲中对日本侵略者暴行的控诉,如描述百姓流离失所、惨遭杀戮的部分,与世界其他被法西斯侵略地区人民的苦难经历相似,唤起了世界人民对法西斯侵略行为的

谴责与对正义的追求。如“流亡三部曲”之二《流亡》描写的“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其歌词接续了《松花江上》的内容,叙述了东北人民被迫离开家乡故土的悲戚,反映了战争给人类带来的普遍创伤。这种情感跨越了国界,让全世界理解反法西斯斗争的紧迫性与必要性,成为人类在黑暗时期追求解放与自由的共同精神纽带。

随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逐渐形成,很多抗战歌曲也开始在国际上传播开来,遍及美国、欧洲、印度、非洲等地。1940年,歌手保罗·罗伯逊在纽约一场露天音乐会上,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后将其录制成唱片,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发行^[10]。许多国家的人民通过这些抗战歌曲了解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事迹和不屈精神,对中国的抗战事业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2. 对国际文化交流的促进

抗战音乐不仅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文化记忆,更是世界反法西斯历史声音的一部分。东北抗战音乐作为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代表,为中国本土文化的跨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一些反映东北抗战的音乐作品以其独特的旋律、节奏和歌词,吸引了国际友人的关注,通过影视作品、出版物及外国记者、传教士等传播到海外,让世界了解中国东北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英勇抗争和坚韧精神,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同情。如1938年,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到中国拍摄纪录片《一九三八年的中国》,在纪录片中就有一个镜头拍摄的是中国人民升国旗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场面。有学者认为,这是西方社会接触中国抗战歌曲的最重要途径^[11]。此外,东北抗战歌曲也受到苏联、朝鲜、美国、法国等国家歌曲的影响,如“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成立纪念歌》便是根据美国歌曲《佐治亚进军》的旋律填词而成。《誓死不当亡国奴》是根据苏联歌曲《布琼尼骑兵团》的旋律填词而成”^[12],《农民暴动歌》等运用了朝鲜民歌曲调,这种跨文化交流

不仅提升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增添了独特的东方色彩。

东北抗战音乐作为东亚战场反法西斯斗争的声音见证，以其独特的叙事维度融入世界和平文化的基因库，成为人类反思战争、珍视和平的重要精神资源。其艺术表达中蕴含的“反侵略”内核与“护家园”情怀，超越了地域与民族的界限，直指人类对生存权、发展权的共同诉求。这些东北抗联歌曲中“宁死不屈”的抗争精神，与世界各国反法西斯力量的斗争意志形成跨时空共鸣，充分体现出国际主义精神特征，揭示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伟大真理。

三、东北抗战音乐文化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音乐是一种整理过去、塑造经验时间结构的装置。”^[13]音乐不仅反映社会结构，还在日常生活中塑造人们对时间、情绪与自我历史的感知。东北抗战音乐承载了东北人民在抗战岁月中的情感与精神，是中华民族抗战历史的生动写照。东北抗战音乐以其独特的历史语境、艺术表达与精神内核，历经时代淘洗仍散发深刻的思想光芒，为当代社会在精神传承、文化发展与艺术创新等维度提供了具有历史纵深与现实意义的启示。

（一）民族精神的当代诠释

1. 爱国主义教育的谱系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吉林考察时指出，要把这些红色资源作为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初心、永担使命。”^[14]东北抗联精神和东北抗战音乐文化无疑是历史厚重、特色鲜明的红色资源。东北抗战音乐中处处流淌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其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怀，并非单一化的情感宣泄，而是构建了相对完整的精神谱系，其内核是对“家园”的具象化守护。如《松花江上》以“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呢喃，将长白山、黑土地

等地理符号转化为民族情感的锚点，其外延则扩展为对“民族生存权”的坚决捍卫。这种情怀的独特性在于将个体命运与国家命运、乡土记忆与民族尊严深度绑定，形成了“小我”与“大我”共生共荣的价值逻辑，正如东北抗联歌曲《万众一心保家园》中“中华民族都抗日，万众一心保家园”及贺绿汀创作的《保家乡》中“保家乡就是保中国”的朴素认知，实则暗合了“国家是放大的家园”这一深层哲学理念。

2. 坚韧不拔意志的历史重构

当年，东北抗联将士之所以能够义无反顾地勇赴国难，长期抗战，面对酷刑与死亡仍坚贞不屈，是因为他们具有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东北抗战音乐承载的坚韧不拔，绝非简单的顽强不屈，而是在极端困境中形成的精神意志。艺术作品在结构层面与社会意识形态同构，它们并非“反映”，而是“重写社会经验”。从历史维度看，杨靖宇将军创作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背后是东北抗联战士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林海雪原中，以草根树皮裹腹、以篝火雪洞为营的铁血抗争与生存智慧。这种坚韧既包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更蕴含“因地制宜”的理性。它打破了英雄主义的浪漫化想象，揭示出坚韧的本质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现实能力。

（二）文化发展的精神根基

1. 地域文化的活态传承

音乐是地域文化的重要体现形式。东北抗战音乐，本质上源于其对东北地域文化基因的深度激活与创造性重构。其艺术实践绝非简单挪用二人转的唱腔、东北民歌的曲调，而是将东北民间音乐中“刚健质朴”的审美特质与“家国同构”的时代主题相融合。东北抗联歌曲、歌谣中既保留了东北小调的叙事性，又通过节奏强化、歌词重构，使原本抒发乡土情怀的旋律升华为呼唤抗争的战歌，揭示了地域文化传承的核心规律。地域文化不是静态的“文化标本”，而是可被时代精神赋能的“动态系统”，其保护与传承的关键是找到传统基因与当代价值的契合点。

2. 文化自信的实践表达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文化自信,担当文化抗战的领导责任,高举文化统一战线旗帜,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东北抗战音乐文化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抗战文化形态,成为中国抗战文化东北篇章的重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和民族特征:它并非基于文化优越性的自诩,而是在与侵略文化的对抗中、在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实践中生成的文化自信。这种自信的核心在于文化主体性的坚守,既不盲从外来文化的霸权话语,也不固守传统的封闭形态,而是以我为主的姿态吸纳多重元素,最终形成服务于民族解放的文化合力。正如《义勇军进行曲》既借鉴了西方进行曲的节奏逻辑,又牢牢扎根中国民间音乐的土壤,其艺术实践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生动诠释。

(三) 艺术创新的灵感源泉

1. 内容与形式创新的辩证统一

“内容之所以成为内容是由于它包括有成熟的形式在内。换言之,内容是具有形式的内容,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内容,在真正的艺术作品之中,二者不能被分离开。也就是黑格尔所强调的,只有内容与形式都表明为彻底的统一的,才是真正的艺术品。”^[15]东北抗战音乐的艺术创新,本质上就是内容与形式的深度耦合,其背后蕴含着艺术创作的核心规律,以及在服务时代需求的目标下形成的动态平衡。从内容创新上看,其突破在于将“抗日救亡”这一宏大主题转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叙事。或通过《松花江上》对失去家园的个体创伤的刻画,实现民族苦难的共情传递;或借助《露营之歌》对“篝火、密林”等战斗场景的写实描绘,让抗争精神具象化;这种“宏大主题个体化”“抽象精神场景化”的处理方式,打破了传统音乐对风花雪月的题材依赖,使音乐成为承载历史记忆与民族意志的有声档案。形式创新则体现为对艺术表现力的系统性拓展。一方面,“吸纳民间音乐的原生形态,将东北地区民间音乐粗犷、豪放、豁达的风格融入作品中”^[16],如二人

转的跳进唱腔、东北民歌的衬词技巧,赋予作品“接地气”的传播力;另一方面,引入合唱、组歌等集体性表现形式,如《九一八大合唱》的多声部结构,通过多声部叠加强化团结抗争的情感张力,形成个体倾诉与集体呐喊的艺术互补。这种创新不是形式主义的炫技,而是服务于内容的创新表达。当抗战需要凝聚众志时,合唱的齐整性便成为精神动员的利器;当需要唤醒个体对家园的眷恋时,民歌的抒情性便成为情感共鸣的纽带。

2. 艺术与社会生活互动的机制建构

“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东西,音乐生产本身是以社会为中介的,不是某种直接的东西。”^[17]音乐不仅是审美对象,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它的生成、传播与接受都深深根植于社会结构中。东北抗战音乐搭建起艺术创作与战时社会生活的互动纽带,成为特定历史语境下凝聚抗战士气的重要文化载体。它既是社会现实的“镜像”,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杠杆”。作为“镜像”,其旋律中清晰可辨东北民众的生存状态,如《逃难歌》中“背井离乡泪汪汪”的悲戚,是对殖民压迫下民生凋敝的真实记录;作为“杠杆”,其通过情感唤醒与价值引领重塑社会心理,如《义勇军誓词歌》中“拿起刀枪向前冲!冒着敌人枪林弹雨向前冲!携起手,肩并肩。豁出命,向前冲”的号召,将个体愤怒转化为集体行动,使音乐成为“看不见的战线”。这种通过歌词的叙事性来凝聚共识,最终实现情感认同—价值共识—行动转化的传导。

四、结语

东北抗战音乐作为中华民族特殊历史境遇中形成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从精神传承维度看,其蕴含的爱国主义情怀并非抽象符号,而是与故土认同、民族存续相关的价值体系,其彰显的坚韧不拔的意志,是极端困境中淬炼的生存智慧与信念力量,为当代精神建构提供历史范本。从文化发展维度看,其扎根东北地域文化土壤、融合民间艺术元

素的实践，揭示地域文化“传统基因与时代精神共生”的传承规律，为文化自信培育提供方法论启示——自信源于对本土文化的深刻认知与创造性转化。从艺术创新维度看，其实现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以抗战主题赋予音乐思想重量，以多元形式拓展表达边界，印证艺术“回应时代、服务社会”的本质属性。珍视这份遗产，需要超越简单的历史记忆，将其转化为民族复兴的精神资源与文化动能，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使其革命文化精神之光照亮中华文明前行之路。

参考文献：

- [1]王继平. 抗日烽火中高擎的文化旗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抗战及其伟大意义[N]. 光明日报, 2025-06-18(11).
- [2]赵恒心. 不灭的记忆 历史的回响：《九一八大合唱》[J]. 共产党员, 2024(2): 46-47.
- [3]吴海勇. 《义勇军进行曲》：激励中华民族永远前进！前进！前进！进！[N]. 光明日报, 2025-06-26(1).
- [4]习近平.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20-09-04(2).
- [5]ADORNO T W. Philosophy of new music[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6: 32.
- [6]陈池瑜. 加强抗战文艺史料整理与研究[J]. 中国民族

美术, 2025(2): 5-13.

- [7]魏立诚.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读扬·阿斯曼《文化记忆》[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2(12): 88-89.
- [8]李红娟. 东北抗联文化特征探析：以东北抗联歌曲为中心[J]. 社会科学战线, 2017(8): 239-242.
- [9]李诗源. 抗战音乐：为民族留下永恒的文化记忆[N]. 文艺报, 2025-07-14(4).
- [10]刘昊. 抗战之歌：《义勇军进行曲》[J]. 党史纵横, 2024(1): 38-39.
- [11]徐越北, 洛秦. 抗战歌曲从中国走向西方(1938—1945)：以英文版《中国抗战歌曲集》及《义勇军进行曲》在美国的传播为例[J]. 音乐探索, 2025(2): 59-69.
- [12]吴贡山, 陈丽娟. 东北抗联歌曲研究[J]. 艺术教育, 2006(4): 87-89.
- [13]DENORA T. Music in everyday lif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7.
- [14]仲海涛. 传承东北抗联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N]. 光明日报, 2025-07-07(6).
- [15]童庆炳. 论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矛盾[J]. 文艺理论研究, 1991(2): 12-20.
- [16]李昊朗. 东北民歌素材在音乐创作中的应用及方法探讨[J]. 乐府新声, 2024(4): 23-28.
- [17]阿多诺. 音乐社会学导论[M]. 梁艳萍, 马卫星, 曹俊峰, 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8: 264.

(上接第94页)

- [5]何士德. 《新四军军歌》创作前后[M]//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88: 80.
- [6]希伯. 重访新四军占领区[M]//《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委会. 新四军·参考资料：1.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15: 26.
- [7]晓河. 为英雄射击手歌唱：记《罗炳辉射击手》歌曲创作前后[M]//罗新安. 罗炳辉百年经纬. 上海：中西书局, 2015: 315.
- [8]金锋. 高邮战役是新四军对拒降日伪军的最后一击：浅

- 析高邮战役的历史贡献及现实意义[C]//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论新四军对日作战研讨会文集.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7: 150.
- [9]贝尔登. 新型的人民军队[M]//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 新四军·参考资料：1.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2: 474.
- [10][12]晓河, 胡士平. 冒着敌人炮火英勇前进的新四军音乐活动[M]//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 铁流：新四军文化工作专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2: 294, 296.